

古籍研究

GUJI YANJIU GUJI YANJIU

2004·卷上 (总第45期)

不遺根錫
宸旨特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牌尚虞舛誤干冒
宸展伏增惶越慶曆四季二月二
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潞洹河瑄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安徽大學出版社

本刊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会指导

古 籍 研 究

2004·卷上(总第45期)

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省古籍整理委员会办公室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庆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 办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研究.2004 卷上/陶新民主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7
ISBN 7-81052-872-6

I.古... II.陶... III.古籍-丛刊 IV.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366 号

古籍研究 2004·卷上

编辑 《古籍研究》编辑部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社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政编码 230039
电话传真 0551-5107719(总编室)
0551-5107784(发行部)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mm×1168mm 1/16
字数 300 千
印张 20
版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ISBN7-81052-872-6/K·64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退换。

告 读 者

《古籍研究》自 1986 年创刊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仁大力支持,成为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颇受欢迎的学术园地,刊载了大量学术品位高的文章。

由于本刊一直以内部资料形式出现,许多读者与学人来信反映不易见到,需多方寻求方得一睹。因此,迫切希望本刊能公开出版发行。现在本刊交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满足大家的要求,亦学界一幸事盛举矣。

本刊仍坚持一贯的办刊宗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反映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公开出版后的《古籍研究》由原来的每年四期暂时改为每年一卷两期。每期的容量在三十万字左右,两期相当于原来四期的容量。

欢迎相关刊物与本刊交换;欢迎读者订阅。

本刊欢迎广大学人惠赐下列稿件:

- 1、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的理论探讨、方法论探讨和经验体会;
- 2、有关目录、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 3、对历代作家、学者的思想、著作和流派的学术探讨;
- 4、对重要典籍的评介;
- 5、对古籍整理成果的评论;
- 6、有关古籍和历代学者的珍贵资料(包括手稿、读书札记等,手稿可附照片)的辑录及考证;
- 7、国内外整理、研究我国古籍的学术动态和资料介绍;
- 8、文稿以不超过 8000 字为宜(特约稿除外),一旦刊出,酌付稿酬;如半年内未被采用,可自行处理。

来稿请寄: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编辑部 邮编:230039

联系电话:0551-5107349 5107360

古籍研究编辑部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傅璇琮 邓绍基 贾文昭 严云绶

主 编 陶新民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副 主 编 纪健生 孙维城 胡益民 诸伟奇

编 委 牛继清 纪健生 孙维城 赵应铎

胡益民 徐凌云 郭全芝 诸伟奇

陶新民

执行主编 胡益民

目 录

《五代史书汇编》序	傅璇琮 徐海荣 (1)
《辽金诗学思想研究》序	邓绍基 (10)
《宫体诗研究》序	陈庆元 (14)
《古典文学论辩集》序	贾文昭 (18)
《悔邨遗稿》《石山遗稿》跋	张伯伟 (24)
《二十四诗品》真伪之争与唐代文献考据方法	陈尚君 (26)
“文字之表”与“二十四韵”——读《也谈〈二十四诗品〉》两点补充	陈良运 (38)
孔孟·朱熹·戴震——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	王国良 (43)
略论朱熹的民本思想	杨国宜 (52)
《黄老帛书》成书年代新论	张增田 (67)
道家佚书《郑长者》试探	黄志豪 (74)
明代常熟私家藏书与文化发展	陈颂华 廖菊棟 (80)
《寄园寄所寄》的编撰特点及文献价值	刘道胜 (86)
甲骨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的简要考察	周有斌 (93)
说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滕”地	吴良宝 (96)
《论语》“君子不器”新解	庞光华 (98)
《诗经·云汉》与瘞埋之祭	王 政 (102)
《唐风·羔裘》臆说	王治理 (108)
说“雇”	徐时仪 (112)
敦煌写本 P.4044 号《目连变文》钩沉	叶贵良 (115)
《国语·周语下》“周官”标点辨疑	刘 伟 (118)
《尔雅·释詁》郭璞注中的双音词	曾昭聪 (120)
新编古人年谱常见讹误辨析——以陈飞龙《王思任年谱》为例	吕 明 (124)
《古文观止》译注商榷	李海燕 (129)
韩愈集欧阳修校理本考述	刘真伦 (133)

慈觉禅师宗赜佚诗补辑	李小荣 (142)
《刘铭传文集》补遗	诸伟奇 (151)
翁方纲评点《山谷外集》辑考	周兴陆 (153)
《后村千家诗》的真伪及《千家诗》的流传	王述尧 (158)
杜甫与高适蜀中关系考辨	李霜琴 (162)
王灼生年新证	钱建状 (169)
新近发现的《阮氏宗谱》评介	胡金望 (172)
程燮《咏史新乐府》考述	黎如芷 (181)
论龙树《中论》的思辨性与文学性	王丽洁 (185)
唐代杂说研究	南哲镇 (196)
密宗与唐五代文学创作	
——密宗成就剑法及密宗民俗信仰对小说创作之影响散论 ...	夏广兴 (201)
论张先对苏轼词学思想的影响	孙维城 (211)
在学术与文章之间——清代散文发展历程侧记	曹虹 (219)
吴梅村“诗史”分类论略	杜莹杰 (225)
清末民初词学综论	刘梦芙 (235)
万树《词律》词学之贡献及意义	鲍恒 (242)
清代诗法类著作叙录	蒋寅 (259)
清代稀见杜集书目提要十种	张忠纲 (271)
读几种稀见清人诗文集	朱则杰 (282)
清人诗文集作者生卒年续考	江庆柏 (293)
易学研究的可喜成果——读《三坟易探微》	宣守有 (299)
诗仙李白的文化解读——读《李白研究管窥》	林大志 (303)
一部后出转精的李贺诗集新注本	
——王友胜、李德辉校注《李贺集》评介	周尚义 (305)
学科意识与学术领域的开拓	
——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简评	吴怀东 胡益民 (309)
元代文化研究暨《全元文》编纂研讨会综述	青华 (312)

《五代史书汇编》序^①

傅璇琮 徐海荣

—

五代处于唐、宋之间,而唐和宋,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高峰时期。过去长时期中,一般认为五代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短促,从北方中原地区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纪年来说,不过五十几年(907—960);二是南北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社会动乱,历史进程中没有什么发展。也正因此,五代史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及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将其作为隋唐史的延续。古代就已如此,如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以及清代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书名均标为唐,实际上却都包含全五代的诗文和作家。二十世纪不少历史学或文学史著作,也大多将五代附于唐末部分,很少独立专书。

实际上五代并不局限于北方五朝,梁、唐、晋、汉、周主要在黄河流域,在长江流域及往南延伸至闽、浙、湖南、两广等地,先后有九个地方政权——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闽、荆南、楚、南汉,以及山西部分地区的北汉,通称十国。而这十个政权的实际建立,前蜀在公元891年(唐昭宗大顺二年),吴在892年(昭宗景福元年),闽在893年(昭宗景福二年),楚马殷在896年(昭宗乾宁三年)。南唐则为宋灭于975年(宋太祖开宝八年),吴越于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归附,北汉于979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投降。以此计算,则前后所历的时间,既远超盛唐的开元、天宝,也相当于中唐肃宗至文宗时期,因此不能以所谓历时短促而过分轻视。

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虽然这几十年中没有出现过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但应当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阶段。五代处于由唐入宋的过渡时期,而这个过渡,在由中古到近古的转变中帶有一定关键性质,只有透彻地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宋代及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诸形态才能有清楚的了解。史学界已注意

到,从六朝沿袭至唐朝的高门世族,至宋朝已完全衰落,所谓王谢门第,已荡然无存;土地占有形态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即由领主庄园制向一般地主占有制转变;宦官操持朝政,藩镇割据独立,在北宋也已不存。而这些都是通过五代而逐步转变的。另外,就以广义的文化进展来说,自唐末起,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人才大批南迁,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明显超过黄河流域。经济重心的转移也促使南方文化的兴起。同时,五代时雕版印刷的推进,对于文化典籍的传播起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作用,也直接促进宋代文献编纂和印刷事业的发展。以文学来说,词在五代,是词史发展的关键,后蜀时编撰的《花间集》是中国词学的范例之作,这已为世所共识,而从唐末开始,历五代几十年,诗歌语言的日常生活化、通俗化的倾向,对宋诗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五代时期的文化形态,表现一种过渡的趋向和潮流,而这种趋向与潮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促进新的文化现象的兴起。因此,五代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学术界对此已有所注意。正因如此,近十余年来,有关五代政治、经济,及史学、文学、艺术等,都有新著刊出,预示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将有新的进展。

二

正因为配合这一研究趋向,我们经与有关专家商议,特为编纂这部《五代史书汇编》。过去相当一个时期,五代史研究之所以薄弱,除了上面所说的对五代的历史意义认识不够以外,就是史料整理很不充分,在史料运用上大多仅着眼于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局限性较大。这样,研究的视野就不宽,一方面仅集中于北方几个朝代的更替,南方地区仅概略叙述;另一方面则将重点放在政权上层,涉及面不广,看不到当时南北广大地区社会深层的变化。有鉴于此,我们这次史料辑集面就较广,除一般所谓杂史、野史外,还包括历史体和小说体的笔记、诗话、名画录、艺文志,以及考证性札记等,较广泛地反映五代十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面貌,以及五代史史书研究的进程。全书分甲、乙、丙三编,甲编为自宋至清有关新旧《五代史》的考证与评议,乙编为北方五代史的记述,丙编为十国史的记述,共收书四十九种,三百多卷,约四百五十余万字,这对一定历史时期史料的辑集还是少见的。

这套书的特点,大致有二:一是如前所说,史料辑集面较广,所收书各有文献史料特色与价值;二是编纂与整理方式力求规范化、科学化,表现在版本流传的探索与底本的选择,详作校勘,提供信实可靠的新的点校本,同时每一种书都撰有能体现当前学术

成果的提要,即校点说明。现在拟依此加以介绍,以便于读者检核全书。

甲编有关新旧《五代史》的考证,其中考证《旧五代史》的一种,考证《新五代史》的六种。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也有所考辨,因是全书的一部分,这次就不录。现在我们所辑集的这七部著作,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这两部《五代史》所作的最全面的辨析与考异。今天我们要研究五代的具体史事,考索这两部史书所记是否信实,是离不开这七部考证著作的。

《旧五代史》为北宋初薛居正监修,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修成,后曾刊印。但自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问世后,此书影响逐渐减弱。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曾明令学官只能读欧史。《旧五代史》大约于明代就绝版,至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就由馆臣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成书,有一百五十卷。邵晋涵在辑集时,又仿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文集、碑碣、笔记、地方志等八十余种书中辑录有关资料,撰成考异。其史料价值,一为补阙,二为辨异。今传《旧五代史》各本,都有《考异》附于下文的,但经比勘,各本所附与我们这次所提供的国家图书馆所藏蓝墨格抄本专书,不尽相同,这部五卷本的《旧五代史考》,多可补《四库全书》等本子所缺。

甲编所收第二部书为宋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据《永乐大典》辑本)。吴缜另有《新唐书纠谬》,也是指欧阳修之失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评价不高,认为是“有意掊击”,“吹毛求疵”,而对《五代史记纂误》则较为肯定,认为欧书及徐无党注,经吴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结”。

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于《四库》本后,又有知不足斋本印行。另有两部较有特色的书,却不为世人所知,这就是我们这次甲编所收的杨陆荣《五代史志疑》、徐炯《五代史记补考》。杨、徐都是康熙时人,而吴缜《五代史记纂误》此时尚无传本,至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才从《永乐大典》辑出,因此杨、徐二人是完全根据自己的独立研究而撰写的。杨陆荣也与吴缜一样,采取纪、传比勘的本校法,摘出欧书的错失,有相当一部分是《五代史记纂误》所无的,是对吴书的重要补充。同时他又不限于本校,凭其渊博的学识,指出欧史多有不当的记载,并且对欧阳修所标榜的正统观念也提出批评,认为“五季十国彼此相等,不必独伪十国”,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见识,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徐炯的《五代史记补考》,有二十四卷,三十多万字,更有特点。欧阳修与宋祁等合作,撰《新唐书》,除本纪、列传外,尚有志、表,《新五代史》则除纪、传及二考(《司天考》、《职方考》)外,无志、表。他曾两次提及:“五代乱世,文字不完”(卷五九《司天考》、卷六〇《职方考》),意谓五代受战乱影响,文献资料缺乏,未能编修较有规模的《艺文志》等,因此《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明确指责：“此书之失，此为最大。”徐炯可能也有见于此，他所谓“补考”，就是接续欧史的《司天考》、《职方考》之后，作《五行考》二卷，《百官考》三卷，《选举考》三卷，《食货考》三卷，《赋役考》二卷，《征榷考》一卷，《礼乐考》五卷，《刑法考》二卷，《军旅考》一卷，《艺文考》三卷，可以说是对《新五代史》作重大的补充。而其取材，除《五代会要》外，又采辑卷帙庞大的《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并广及杂史、笔记等。

在这之后，又有乾隆时吴兰庭的《五代史记纂误补》，道光时周寿昌《五代史记纂误补续》，光绪时吴光耀《五代史记纂误续补》，都对吴书有所补充。这几位史学修养都很高，钱大昕认为吴兰庭在史学成就上可与邵晋涵并称，其所著除参校唐宋时典籍外，还采录清人著作，有引用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何焯等之说，这种古今沟通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

乙编记述五代史者有十四种。这部分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大部分的著者多为五代和北宋初人，均能据亲身经历，就见闻所及或前人口耳相传，记述当时情事，多为正史所不及。如列为乙部第一种的《玉堂闲话》，著者王仁裕(877—956)，历仕唐、晋、汉、周，曾为秦州节度判官，在前蜀又曾为翰林学士，书中除记有唐末至五代一些要事与名人外，特别于秦陇、蜀中水土风物，所记甚详；王氏以文学名世，书中记有游历各地之诗，对研究五代诗歌创作也很有参考价值。同是五代人所作，列为乙编第二书的，是《于阕国行程录》，著者平居晦于晋天福中任金州防御判官，天福三年(938)随供奉官张匡邺出使于阕，至七年(942)返回后撰此行程回忆录，记录出使始末及沿途所见山川风物，对当时于阕国的政治、文化情况，也有详记。于阕为唐时“安西四镇”之一，属安西都护府，唐末归属吐蕃，其地在今新疆和田县境内。这应当说是难得的中古时期西北实地见闻录。又如由周入宋的张齐贤，其《洛阳搢绅旧闻记》，记中原名城洛阳的社会风尚与名人轶事，文笔生动，细腻传神，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提出有些所记与史书不合，但仍云：“其他佚事，亦颇足资博览者，固可与《五代史阙文》诸书，同备读史之考证也。”此外提及的《五代史阙文》，为宋初名家王禹偁(954—1001)所作，也收入本编。其自序称书中多采“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其书篇幅虽小，仅一卷，但多涉五代重要史实，清王士禛《香祖笔记》赞誉其“辨证精严，足正史官之谬”(卷四)。

乙编所收书的第二个特色，是涉及面广，除前面提及的几种著作外，又如《五代会要》，全面记述中原五朝的典章制度，特别是因此书始修于周，成于宋初(乾德元年，963)，从当时尚存的实录中援引不少奏章诏令，极有史料价值。又如相传为北宋韩思所作的《五代登科录》，虽未载登科的姓名及试题，但记有历年进士、诸科人数，这是五代

时仅有的有关科举考试的原始文件,因此清人徐松作《登科记考》,即据此为线索,再蒐辑有关文献,补缀人名。另北宋中期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与丙编所收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可以说是研究五代时期南北二地绘画艺术的重要史料。五代时有好几位名画家,如以山水画著称的荆浩、关仝,以花鸟画著称的徐熙、黄荃,人物画家的张图、赵鼎、贯休等。动乱时期的五代,仍有不少艺术名家出现,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乙编中清人所著,有三种也涉及文学、文献的,如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的《五代诗话》,书中辑集宋至清的史书、文集、笔记、诗话等书二百六十余种,记唐末五代诗家四百多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采摭繁富,五代逸闻琐事,几于搜括无遗”。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五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另外两书,都名为《补五代艺文志》,分别由道光时顾櫲三、咸丰时宋祖骏编撰的。新旧《五代史》均无《艺文志》,这二书与丙编所收王振民《补南唐艺文志》,及前所述徐炯《五代史记补考》的《艺文考》,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提供五代经史子集四部的著作目录,这也是清人治学的特点。

丙编记十国史事,收书较多,有二十八种,计有五代人所著二种,宋人所著十八种,明人所著一种,清人所著七种。我们的编排是,综述诸国史事的三种,先列于前,即宋初佚名《五国故事》,宋路振(956—1014)《九国志》,清康熙时吴任臣《十国春秋》,以后则按国来分,记南唐的有十一种,记蜀国(包括前蜀、后蜀)的有七种,其他则吴越一种,楚、荆南一种,南汉四种,每一类则按撰写者时代先后排列。这里可以注意的是,南唐与蜀,史书最多。唐末中原兵乱,北方士人避难南下,至蜀与吴的较多,吴的文人后多沿袭至南唐。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篇第三章记十国事,曾云:“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文学的重镇。”明人赵世延为陆游《南唐书》所作序,有云:“虽为国褊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确与文化繁荣,有密切的联系。

与前乙编几部书同样,丙编好几部书的著者,有五代人,有五代人入宋的,又虽为宋人,但因在宋初,能凭口耳相传得之于五代故老。因此这些书所记,看似琐杂,实多为正史所未及,而且我们现在从社会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载,可能涵义更深。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对宋初佚名《五国故事》,虽议其为“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但又认为“考古在于博征,固未可以琐杂废也”。又如宋初周羽翀《三楚新录》,其所载史事,多据故老口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称其多与史书不合,但仍云:“其所闻佚事,为史所不载者,亦多可采。稗官野记,古所不废。”另外,这些书还有不少文献价值,如由蜀入宋的勾延庆,其《锦里耆旧传》记王、孟二氏在蜀地兴衰事迹,其中“于诏檄、章表、书檄之文,载之独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六)。又如后蜀

何光远《鉴诫录》，记唐至五代遗闻佚事，以蜀地居多，书中多采诗人诗作及本事，清康熙时修《全唐诗》，据以辑入者有数十首。

丙编清人所著的几部书，也有其特点，就是能广泛辑集前书，予以综合的记述，同时对前人所记有所误失的，则加以正补。最明显的是清康熙时吴任臣，其所著《十国春秋》，共一百十四卷，涵盖南北十国，除列国纪、传外，还撰有《十国纪元世系列》、《地理表》、《藩镇表》、《百官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极称许其“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亭林文集》卷六《广师》）。诗文评论家洪亮吉在其所著《北江诗话》中还特提及《十国春秋》，称其“搜采极博”。史学家王鸣盛对《十国春秋》之五表，更为肯定：“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又谓《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十七史商榷》卷九八）。又如清道光时梁廷桢所作《南汉书》、《南汉丛录》，嘉庆时吴兰修所作《南汉记》、《南汉地理表》，都对偏于一隅、向为人忽视的南汉（两广地区）作全面的记述，辑集的材料既广，且每条均注明出处，备异同，资考证，与吴任臣《十国春秋》在小注中引前人史料纠缪误同样，均显示清人治史的博洽与谨严。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有些书，有部分重复，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为便于查阅，这次仍予收录。如明陈霆《唐余记传》，十八卷，以纪传体裁记南唐国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方面评其以南唐继李唐正统为非，一方面又认为已有马令、陆游《南唐书》，“何必作此屋下屋”，因而列为“存目”。应当说，南唐的建立，对当时江淮地区的社会安定、经济复兴、文学发展是起一定积极作用的，陈霆并不完全从南唐承袭唐朝正统出发来编撰此书，他在自序中称“斋居之暇，因网罗轶遗，补辑残阙，去舛订是，列为一书”。书中所辑资料，是可以增补马、陆二书的，且于记叙之余，间有议论，也可以见出明人的史识。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在记南唐史事时，也屡次引述其书。故我们仍将其编入。但明末李清的《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以陆游书为主，将马令书补入，虽也采择其他所谓野史，但总因重复过多，就不编入。同时，宋初还有一些笔记，如《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等，也记有五代史事的，尤其是一些文集，如罗隐、黄滔、徐铉等集，其中记序、奏议、碑传，多与朝政史事有关。但这些书，总非专史，限于篇幅，不宜全录，而若挑选，编纂加工量又大。经考虑，以后如有条件，可再有“补编”，将有关资料重加辑录，这当能使五代史料更为完备。

三

这次我们除广辑史书外,还按符合现代科学意义的规范化要求,对全书进行标点,校勘,其整理范围,包括:对每一部书都写有提要,即校点说明;考查每一部书的版本流传及著录情况,选择较为信实的本子作为底本,再参核其他本子及有关典籍加以校勘,写有校记;有些原书已失,则尽可能考核有关资料,加以辑佚;有些书在流传中有缺漏,也酌予补辑,附于书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汇编”,提供较为完整、可靠的新本。

二十世纪前半期与后半期,也曾有史书汇编之作,如《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三编》等,有关五代史也有少数几种编入。但这些汇编书都为影印。现在编古籍大书,确有一种影印的风气。影印能保持早期刊本、抄本的原貌,特别是对一些善孤本,是有意义的。但从全局来说,古籍整理不能仅限于影印。从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标点和校勘的作用是大于影印的。从考订、辨异、纠误来说,校点所能达到的质量要求,更在影印之上。我们现在不能一味耽信于所谓宋元善本。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就提出:“今人重宋槧本书,谓必无差误,却不尽然。”并特别引陆游《跋历代陵名》中的话:“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讎。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因此钱氏认为:“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无误也。”

从版本探索来说,这里不妨举一二个例子。如乙编所收北宋史温《钓矶立谈》,其收虽仅一卷,但版本却甚复杂。校点者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虞云国教授经调查,将其版本流传归纳为三个系统,一是南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本,后毛晋汲古斋影宋抄本、《四库全书》本都属这一系统;二为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在扬州所刊《楝亭十二种》本,后清季张氏《适园丛书》本据曹本翻印;第三系统不甚清楚,但可考知《知不足斋丛书》本曾据毛氏汲古斋旧抄本与曹氏《楝亭十二种》本汇校,兼有两本之长。在清理出这三个系统的基础上,这次点校就选择《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将鲍氏据两本所校的校记适当吸取,并再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校。由此可见古籍整理,在校勘上是需要版本的系统考索与目录学的基本素养的。

又如宋初郑文宝《南唐近事》,经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张剑光教授细加调查,得知有明万历刻本和崇祯刻本,均为三卷,而清《四库全书》本作二卷,另外《续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唐宋丛书》等本则又为一卷。在卷数不同的情况下,校点者就细阅原文,得出内容基本相同的结论,就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诸本,另还参

考他书,辑得佚文若干条,编为一卷,附于书末。这就是说,既要普查版本著录情况,又要细核文本,这样就能提供最为齐全的定本,其信实程度是超过早期的所谓善本、孤本的,对研究使用来说更有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曾贻芬教授与中华书局崔文印编审,共同负责甲编七部著作的校点,两位对所援引的书,差不多都一一校核,工作量相当大,而收获也极大。如《五代史记补考》,著者徐炯,其父徐乾学。徐乾学另一子徐骏,雍正时陷文字狱被杀,徐炯此书也就受累一直未能付梓。民国初期张钧衡获此稿本,刻入《适园丛书》,这是清初以来唯一传本,甚可贵,但可能撰时较仓促,又因故未加复核,故错失也较多。这次崔文印编审就细加比勘,补正不少,如《选举考》有一条即据所引《五代会要》补所漏略二十二字,卷十三《征榷考》有一条据所引《册府元龟》也补有二十余字,其余改正一二字者比比皆是。徐炯地下有知,正当感激万分。

正因版本的普查工作做得较细,故本书所选底本也较珍贵。如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选用国家图书馆所藏蓝墨格抄本。杨陆荣《五代史志疑》选用南京图书馆所藏康熙十九年刻本,这都是现存唯一孤本。有些书已佚,这次又重新辑集,如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原为十卷,宋时已佚,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这次就从《太平广记》、《永乐大典》、《锦绣万花谷》、《岁时广记》、《能改斋漫录》等书中辑出183条,使长期佚失的书重现原貌。又如前面已述及的《于阕国行程录》,五代平居晦撰,此书元代以后已失传,陈尚君教授这次特从《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征类本草》卷三、《演繁露》卷一,辑录佚文三则。

至于所收每一种书都撰有提要,即校点说明,这也是这部《汇编》的体例创新之一。每篇提要,都记述著者生平、内容概要、史料价值,及版本著录与整理情况,体现当前的学术成果。这也是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具体结合。如《钓矶立谈》,其著者,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不著撰人,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据该书南宋尹氏书籍铺本也谓“不著名氏”。《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作史虚白,清曹寅《楝亭十二种》本即据此题史虚白撰。而《知不足斋丛书》本鲍廷博跋语又有不同意见,云:“以自序及他书考之,盖虚白仲子之笔”,而其名无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不同意此说,认为“荒谬不足为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以为“此书之作者之名,终莫得而考”。虞云国教授在校点说明中详列各种不同异说,后据《文史》第四十四辑陈尚君《钓矶立谈作者考》,议定为史虚白之孙史温根据五代南唐时山东一无名叟之所述史事与议论而成。又如《吴越备史》的著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最欣博士,在校点说明中提出宋、明时的有关记载,有钱俨、范

垆、林禹等不同说法,经考证,确定为吴越国文穆王钱瓘元第十四子钱俨所作。这些校点说明,实际上都是学术考证。

校点说明在充分肯定各书的史料价值时,有时也中肯指出书中的缺失之处。如《五代诗话》,校点说明指出其中有明显的错误,如卷五罗隐条,引《唐诗纪事》,谓“鄴都罗绍威学隐为诗,自号其文为《偷江东集》”;而同卷另一条引《吴越备史》,却谓“时魏府节度使王智兴学隐诗,自号诗卷为《偷江东集》。”校点说明指出,王智兴,两《唐书》有传,为中唐宪宗、穆宗时人,卒于文宗开成元年(836),而此时罗隐尚未出生,且他又从未仕为魏博节镇。又如吴任臣《十国春秋》,确有极大优点,但校点说明也提出书中疏误之处,较明显的如卷四四前蜀列传《赵蕤传》,称“乾德时著《长短经》十卷行世”。乾德为前蜀后主王衍年号。实则赵蕤为唐玄宗时人,校点说明据《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著录有赵蕤《长经要术》十卷,玄宗于开元时曾召其入宫,他不赴;且李白于开元时曾作诗怀念,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校点说明能如此作,也确显示这部《汇编》的学术品位。

又如陆游《南唐书》,过去的有关记载都未记述陆游何时撰作此书,陆游本人也无自序。这次校点说明注意到书中卷十三《刘仁贍传》后有论云:“乾道、淳熙之间,予游蜀,在成都,见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军节度使告身,白纸书,墨色、印文皆如新。”因此提出,由此可确定此书为陆游自蜀返浙后所作。这是细心研读文本所得,对陆游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

注:

①《五代史书汇编》,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等主编,将由杭州出版社出版。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邮编:100710 责任编辑:徐在国)

《辽金诗学思想研究》序

邓绍基

记得是在 10 年前,1993 年的冬日,《社会科学战线》主编周惠泉先生把他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交付出版社后,来函命我做一序文,盛情难却,我不自量力地写了一篇很不相称的短序,序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前人谈论金代文学,实际上存在着金代文学赖元好问以传的观点。这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或许同这种观点有关,长期以来,研究元好问的论著不断出现,对金代其他作家和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对来说就比较冷落,通论有金一代文学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学人常引以为憾。”这是我的真实感慨,所以我接着又说,《金代文学学发凡》一书“系统地回顾和论述金代文学研究史,实际上又是一部具有通论金代文学性质的专著。友人增新著,学林添佳作,我很钦佩,也很欣慰。”

距我为惠泉先生大著写序时间一年以后,1994 年 12 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晶先生的《辽金诗史》,但当年似乎未见发行,我见到这部著作更晚,或许是 1996 年的秋冬之际了。我为金代文学领域又出现一本系统研究著作而感到高兴。我又从《文学遗产》陶文鹏先生处得知,著者是一位青年学人,原来主攻唐宋文学,后又扩大研究面,对辽金元诗歌都有研究。事实上,我后来又读到了他的元诗论著。1998 年 9 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元史研究会在北京举行“国际元代文化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张晶先生,堪称幸会,虽然交谈不多,却也很感欣慰。

光阴荏苒,转瞬五载。近年来,张晶先生笔耕不止,在撰写一系列宏观探讨古代文化的研究文章同时,又著成辽金文学研究新作《辽金诗学思想研究》一书,真是俊茂好谋,多才多艺。

这部书专论辽金诗学思想,着重研究辽金时期的诗歌理论和意识。无庸说,作为一部系统著作,甚具创意,是一部原创性很强的著作。其中论述金代诗学,丰富详尽,我读后受益非浅。